

总 序：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

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

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

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

从方法上看，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

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

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

于是，这些著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

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

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映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

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

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

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了历史专业人才培养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像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

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阅中肆

外”，“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

是为序。

赵世瑜

1996年3月

目 录

卷 首	历史风云塑造出一个群体	1
第一章	托起游侠的汉代精神风貌	15
	能歌善舞的男人与女人们(17)/松弛 的两性交往(22)/粗率冲动的性情 (27)/尚武的风气(34)/重义的交友之 道(39)/复仇的火焰(44)/闪烁自尊的 汉代人心灵(47)/炽盛的宾客潮(54)/	
第二章	汉代游侠本源透析	65
	汉代侠者的内心世界(66)/汉代游侠 的来源与特质(82)/	
第三章	汉代游侠全视角	93
	汉代游侠的分类(95)/政治型游侠 (97)/豪族型游侠(115)/平民型游侠 (132)/剑客型游侠(136)/	
第四章	汉代地域文化氛围与游侠	161
	汉代游侠的地域分布(162)/京城游 侠篇(175)/	

第五章	汉代侠风与儒者的气象	192
	知识分子与游侠的对话(193)/汉代 文人的自我定位(203)/	
第六章	中外历史上的四个武人集团： 文化的比较	221
尾 声	一自金驼辞汉后	233
附表一	汉代游侠行迹略表	239
附表二	汉代复仇状况简表	260

卷首 历史风云塑造出一个群体

同为汉代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把游侠写得虎虎有生气，而班固却目之为乱世奸雄，从表面上看，这是两种迥然相异的评价。它曾使后人大感困惑，而我们恰可以藉此把握那个时代的脉搏。



一场耗尽元阳的长达 7 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虽然尸横郊野城郭，新坟比邻相望，到处是残垣断壁，但每一个活下来的人毕竟可以在精疲力竭后长舒一口气了。这就是公元前 202 年的中国。

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的二月甲午日，意满志得的汉王刘邦在定陶汜水北岸登基称帝。尽管血色征尘衬印着多少有些寒碜的登基典礼，但却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汉王朝的诞生。

此前稍早一些日子，是一出英雄末路悲剧的落幕：悍勇刚烈却无谋少略的西楚霸王项羽，在丘陵起伏的垓下挥泪诀别爱姬，率 800 余名壮士突围，行至乌江岸边终于没能摆脱紧追不舍的密密麻麻的汉军将士，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拼杀后，“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一代英雄自刎而死。项王败亡后，华夏土地上便再也没有人能与刘邦相抗衡了，7 年内战由此划上了句号。

也是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与项羽之死和刘邦建立汉家江山有关的一个历史事件。项羽麾下有一位名叫季布的“为气任侠”的将军，在楚汉相争的年代里，他屡屡把刘邦打得狼狈不堪。项羽败死之后，刘邦恨意犹在，他以当时最高的赏格——一千斤黄金捕捉季布，并通令天下：胆敢藏匿季布，其家族统统要受惩罚！季布东躲西藏，最后决定去鲁地一位叫朱家的侠者家中为奴避祸。朱家一眼就看出了季布的真实身分，毫不犹豫收留了这位处境窘迫的项羽部将，让他负责农作，并告诫其子：农活要听此奴安排，要和他在一齐吃饭。随后，朱家冒着生命危险乘车赶赴洛阳，请刘邦少时好友汝阴侯夏侯婴为季布说项。朱家语辞恳切，其中有一

句话足以打动当朝最高统治者：如今皇上刚刚取得天下，就以一己之私怨捕捉一个人，难道就用这样的行为让天下都晓得皇上的心胸狭窄吗？！夏侯婴把朱家的话讲给刘邦，皇帝觉得很有道理，立即下令赦免季布。这样，季布在朱家的家中，度过一段时间不长的名为奴仆实为贵宾的平静生活后，很快成为汉中央政府的一名郎中官。^①

这个历史事件给司马迁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他不仅在《史记·季布列传》中用富有感染力的笔调，描述了这个故事的本末，还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把朱家作为汉兴以来的第一位名侠加以赞扬，说朱家的行为虽然常常触犯法律，但却举止仗义，行为廉洁，懂得礼让，十分值得称道。的确如此，与曾是季布同僚，同样为刘邦所忌恨，先为韩信所收留，后又为韩信为保全自己而逼迫自杀的楚将钟离昧相比，季布真是好运气，朱家的英雄本色也更为熠熠闪光。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能找到不顾己危、济人解难的事件或传说，但人们却不难发现它们与西汉前期同类故事的某些区别。朱家的事迹不是个别的，在当时和以后一些年代里，有许多朱家式的人物不断出现，他们被时人称为“侠”或“游侠”。季布在投奔朱家之前，就曾被濮阳侠士周氏所容留。太史公对游侠溢溢于字里行间的赞颂同样也不是偶然的，这是这一时代价值观念和社会舆论的主流。总之，游侠现象和对这一现象的肯定性评价，构成了西汉前期社会风貌的一曲最具时代感的双重奏。仰慕，同情，信任，爱戴，……对游侠群体的这些正面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中——从普通百姓到政府官员，从文人墨客到巨商豪门，从贫寒的贩夫走卒到良田千顷的富人，都有一种对游侠近乎崇拜的心态。朱家

为人排忧解难，关东（泛指今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一带）广大地区的人们都眼巴巴地盼望着结识他。被朱家搭救过的季布，也曾是一位“为气任侠”的侠士，早年因此受到项羽的器重。在汉任职后，侠性不改，他的家乡楚地流传着这样一条民谣：“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很快，这个谣谚便传播到周围地区，季布因之名动天下。季布之弟季心也与乃兄一样喜好任侠，在关中周围方圆几千里有很大的号召力，人们争着为他效尽死命。^②上面提到的刘邦赦免季布，自然有其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但也包含对朱家、季布行为的赞赏成份（这个判断可以从他处死在战场上私放自己的项羽部将丁公之事找到间接证据）。文、景时期，洛阳大侠剧孟不但在民间享有盛誉，而且声闻朝廷，吴楚七国叛乱，率汉军平叛的太尉周亚夫请到剧孟后，竟喜出望外道：吴、楚发动大乱却不找剧孟，我知道他们不会有大的作为了。“众庶荣其（指游侠）名迹，覬而慕之。”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用短短10个字，浓缩了这个时期的世风和人情。

然而，正是这位班固十分尖锐地抨击了他的前辈司马迁对游侠的颂扬。在班固的眼中，游侠是一群作奸犯科、行为暴戾的亡命之徒，是维系国家纲纪礼法的死敌，是社会安定的可怕的破坏者。因此，一篇《史记·游侠列传》乃是贬低贤人褒奖奸雄“是非颇谬于圣人”的不祥文字。^③从表面上看，为了否定司马迁的见解，消解其影响，班固试图把《汉书·游侠传》写成一篇与《史记》的主旨和格调针锋相对的作品，但在对游侠的重视上，班固与司马迁却异曲同工。或者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讨论。不过，几乎所有的后世评论家都更看重班、马之间的差异，他们在比照这

两部表面上看来义趣相左的作品时也难以断定孰优孰劣。近世国学大师章太炎曾不无困惑地写道：“史公重视游侠，其所描写，皆虎虎有生气；班氏反之谓之乱世奸雄，其言实亦有理。是故《史》、《汉》之优劣，未可轻易下断语也。”^④其实，无论在章氏之前，还是在其后；无论是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还是普通百姓，人们对游侠的看法一直错落参差，或褒或贬，有扬有抑。这种情形表明游侠现象在汉代乃至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性与复杂性。换句话说，认识游侠，也就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了解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

在观察汉代游侠活动之前，应该稍花笔墨追溯这个阶层的诞生。

关于游侠的产生，是一个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文化话题，中国古代许多著名学者都对此进行了考察。战国时代法家思想家韩非，从政治家的角度把游侠概括为一个以武力违犯国家禁令的群体。^⑤东汉史学家班固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周王室衰弱，各国诸侯可以违反等级，擅自决定征伐。自齐桓公、晋文公之后，诸侯国中的大夫与陪臣又左右大权。混乱的局面发展到战国，为了加强自身实力，诸国之间或合纵或连横，出现了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和春申君。他们凭借自身是王公的优势，竞相作游侠之事，把有一技之长的人奉若上宾。^⑥北宋文学家苏轼用富有感染力的笔调描写道：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无论是诸侯还是各国的卿相，都争先恐后豢养士人。从务实的谋士说客，到务虚的谈天说地之辈，到善击剑能抗鼎的力士，甚至鸡鸣狗盗之流，都受到他们的礼遇。享受鲜衣美食的宾客，真是数都数不过来。^⑦这些说法在

描绘出侠者形象的同时，也点出了游侠出现的历史环境。

在王权控制有序、社会尊卑等级分明的文化环境中，以武力对包括王权在内的社会传统规范发起挑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尽管有的学者把游侠的萌芽追循到史前时代的尚武之风，但这种设想的依据却是十分薄弱的，它不能解释为何自史前以降到西周的几千年间，游侠无影无踪。尚武可以而且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只是表现为“王于兴师，修我戈矛”的为“王”、“国”的无数次征战。因此，尚武并不是游侠产生的唯一因素，也不是最重要的条件。

从春秋中期开始，随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的剧烈动荡，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不断涌动呈现，我们今天观看这段历史的文字录影时确有目不暇接、心神旌摇之感。

任何一个变革的年代，都有原本默默无闻甚至根本不存在的社会集团迅速“当红”。“士”正是这个时期获益最大的阶层之一，它吸足了时代的养分，从无到有，由弱小而强大，蓬蓬勃勃地发展着。冯友兰先生在《原儒墨》一文中指出，先秦时期的“士”是有才能者的通称。才能包括较高的文化水平，随机应变的能力，出众的武艺勇力，以及擅长其他技艺。靠着才能，“士”从平民中分化脱颖而出，不再与农业生产为伍，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地位；靠着才能，“士”摆脱了旧有的宗法血缘束缚，走南入北，寻找有“慧眼”的主人。靠着才能，“士”在社会上稳稳地站住了脚跟。传统社会秩序被打破后，血缘关系、爵位名号这些昔日荣誉黯然失色，实力成为一切事业最有效的保证。各国的统治者和各国中的公卿贵族，都敏感地察觉到“士”的非同寻常，他们纷纷以优厚条件召募

“士”人。“士”云集公门，肩负起繁多的职责：他们或为主人著书立说，探寻强国之道；或为主人出谋划策于密室，纵横捭阖于宫中；或奔走游说于列国，以三寸不烂之舌取征战之果；或以自己的人格力量为主人凝聚人心；或以强壮的体格和出色的武艺扈从主人，为主人铲除政敌仇人。晋国下卿栾盈为对付权臣范鞅，礼贤下“士”，许多文人力士来到他的门下。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能搏杀猛虎，而被齐景公收入宫中，号为齐国“三士”。可见，春秋时期“士”人所表现出的多姿多彩的责任，乃是“士”人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勇士在这种社会气氛中，与文士一样，搏击政治与社会旋流，建功立业。如同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长串名单——鲁庄公有壮士曹沫，齐庄公有勇士殖绰、郭最、邢蒯、贾举、卢蒲癸、王何，晋卿栾盈有力臣督戎，吴公子光交结勇士专诸、要离——他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生活在当时和稍后的文化精英们，在许多著述如《墨子》、《管子》以及《左传》中，都以热情洋溢的语言称赞他们是“天下之豪杰”，国家安全的保障。

时光很快流到了战国，战乱依旧，动荡依旧，以强凌弱依旧，新说叠出依旧。现在，两种情形——“食客”阶层和“信”的观念植根人心——持续发展，终于最后完成了游侠的铸造程序。

由于社会分化的剧烈，由于才能被作为一种社会认可的交换物换取地位与尊重，战国社会广泛出现了被称为“食客”或“门客”的现象。春秋时养士之风，至此一转突出而具体地表现为养客之风。按照《礼记·曲礼》、《说文》以及《史记》等书的概括与描写，“食客”具有两层含义：第一，以自己的能力

或特长打动权贵名门，使之提供相应规格的生活条件（“食客”的语义即由此来）；第二，为权贵名门出谋献策，赴汤蹈火。在当时人看来，才能有三类。首先是文智之才。包括长于智计谋略，能言善辩。其次，是勇悍刚烈，武艺超群。最后，有一技之长，即所谓“鸡鸣狗盗之徒”。人们的社会地位显得那样的无足轻重，它仅仅是才能的附属物，“毛遂自荐”这个流传千载的成语语源，所叙述的就是战国时这类众多故事中的一例。有时低下的地位甚至成为魅力的象征，魏国门吏侯嬴是“修身洁行数十年”的当世高人，他的低贱地位不仅没有让名动天下的信陵君感到轻蔑，反倒使他更添敬意。侯嬴受到公侯亲往迎接并被拜为上宾的礼遇。^⑥同样，不拘小节的品行也不足以撼动能力的位置，貌辨虽“为人多疵”即有不少小缺点，但却是一个有大节的奇士，齐国靖廓君所看重的正是他的奇节，于是，貌辨被安排在最好的住所，由公侯的长子亲自接待。^⑦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才能与地位待遇基本上只是等值交换关系，因此门客与门客、门客与主人之间形成相对平等的关系。社会的变革不但让许多人走上了“客”的人生道路，而且为“客”的容纳者们营造了广阔的政治和社会时空。这时，秦、齐、楚、韩、赵、魏、燕七雄并立，海内诸侯已不似春秋时那般纷乱。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使各国内的贵族成为主要的养客者。在养客的贵族看来，门下人才济济，是保持已有的土地和财富、“显名于诸侯”的唯一途径。加之，各国国君所关注的是攻城略地、御敌制胜；作为王室宗亲的贵族在本国养客，吸引各国精英异才，还有助于增强本国力量。因此，他们大都对贵族养客表现得颇为宽容。一时之间，各国蓄客之风异常强劲，齐国孟尝君田文、楚国春申君黄歇、赵国平原君



图1 明人绘孟尝君宴客

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是当时养客最多的贵族，其门下之客成百上千，有“四君子”之称。这样，司马迁总结的两类特色鲜明的群体开始纵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这就是“卿相之侠”和“布衣之侠”。* 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游侠集团的正式诞生。

以“四君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都表现出“虚心下士”的风格。

因此，许多在社会分化和动荡中，穷愁潦倒甚至犯罪在逃却具有特殊才能的人，顺理成章来到他们门下。有一次，孟尝君夜宴门客，因灯光被人遮住，客大怒欲走，孟尝君站起，把

*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出“卿相之侠”和“匹夫之侠”两个概念，但却未明言前者有那些人。学者历来对此看法不一。钱穆先生认为：“史公特指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为侠。至其所养，则转不获侠称。故曰：‘匹夫之侠，湮灭不见’。则侠乃养私剑者，而以私剑见养者非侠。故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流谓卿相之侠”（《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二，《释侠》）。江淳先生提出质疑：这4人只是以王者亲属、有士卿相之富厚而得以招天下贤者，“司马迁似未把四君子看作是‘卿相之侠’”（《试论战国游侠》，《文史哲》1989年第4期）。钱先生对游侠的界说虽有可讨论之处，但其指孟尝君们即太史公所说之“卿相之侠”却凿然无疑。其一，孟尝君们均身为贵公卿相，其二，孟尝君们所表现出的人格精神，贴合司马迁所认可的游侠气质。

自己的食物端给此人。他在薛地还特意招纳逃亡的人和有罪的人。信陵君以“为人仁而下士”著称一时，他从不因自己地位高贵傲慢待客，方圆几千里的士人争先恐后赶到他的门下。^⑩重士甚至被推到后人难以理解的极端。平原君宠爱的美人嘲笑路上打水跛子，这个跛者找到平原君，要求杀掉美人。平原君口中答应，心中却不以为然：这个家伙，竟然因一笑就要杀了我的美人，真是太过份了！美人不死，门客纷纷离去。平原君便断然杀了爱姬，门客们又纷纷归来。其间的奥秘被平原君的一个食客道破：“以君之不杀笑跛者，以君为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⑪在“四君子”的门客中，都有许多身怀武技的人。他们有勇力，擅长徒手格斗，精通剑术。平原君曾率 20 名“有勇力、文武兼具”的食客赴楚国求援，决心文请不成，便以武力胁迫楚王。信陵君门客中有著名力士朱亥，他在关键时椎杀魏国大将晋鄙，矫令大破秦军。为国赴难是“四君子”们的又一共同品性。孟尝君曾入秦为相，但他却身在秦地心在齐，冒着生命危险，逃回故土，联络诸国，共同抗秦。秦军直捣赵国国都邯郸，赵危在旦夕。平原君派出门下“敢死之士”三千人，勇陷秦阵，为保卫赵国立下头功。信陵君因与魏王有隙，一度留赵不归，秦国乘机出兵攻赵。起初，信陵君尚以前嫌而怒气未消，当听到门客“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的劝告后，立即扬鞭飞车赶回魏国，与魏王相逢一泣泫前怨。春申君先与楚太子一起勇敢地入秦为人质，并协助太子归楚；担任楚相后，他任用荀子为兰陵令，北上攻灭鲁国，联合诸侯抵御强秦，可谓为楚国尽心尽忠。正因为如此，他们存在的本身，对于覬觎国来说，就是一种威慑力量。信陵君名声